缅怀孟琇焘烈士

张　新　民

孟琇焘（即孟起）同志，一九一三年生。福州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福州典当工会，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闽变期间，任福州典当工会执委。一九三八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在南平参加闽江学委工作。领导教育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一九四一年脱产上山，在省委（即闽浙赣区党委）机关工作。一九四三年春参加省委举办的“城市干部学习班”。一九四四年闽东党组织遭受破坏，省委派琇焘同志去福安重组县委，担任福安县委书记。一九四六年闽江工作委员会成立，琇焘同志任调查研究部长，一九四七年二月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城工部付部长。同年八月因福州海关“布案”被捕入狱，解送南京敌国防部保密局刑讯，一九四八年四月在雨花台慷慨就义。终年三十六岁。

一、邵　武　初　会

我和孟琇焘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邵武。

一九四一年春天，中国上空阴云密布。国民党亲日派制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阴谋配合日寇消灭我抗日军队，并在全国范围内抓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当时，我省委机关设在邵武（二都），建阳（黄坑）交界的山上。邵武是来往省委机关的必经之路。省委指派我在邵武故县街建立交通站，掩护同志们的活动。

一九四一年初冬的一个早晨，一位公务人员打扮的人来找我，自称姓孟。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通报真实姓名的，遵照地下工作的纪律，我也不问他们姓名，（以后在省委机关见面多次，才知道他就是孟琇焘）我的任务是为同志们做好掩蔽工作，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我把来联络站的同志，都象亲朋好友般的款待，外人也不致怀凝。其实，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同志间的感情是胜似骨肉兄弟的。

我和孟琇焘同志一见如故。我向他介绍交通站的情况（当时我的公开职业是伪省赈济会邵武儿童教养院的职员，交通站就设在儿童教养院）。还谈到了当前形势，我们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都十分愤慨。对国共合作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抗战前途怎样？我表示怀凝。他向我解释了党中央一贯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中拥护抗日的实行联合；对他们中的亲日派，则揭露他们的阴谋、跟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已发表声明，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也要求抗战到底，在沦陷区，我们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不抗日，我们也有力量把他们打垮。

琇焘同志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对革命坚定的意志和对人和

霭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二、建 瓯 避 难

一九四二年初夏、日寇向浙赣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伪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及所属机关撤退福建建阳，但反共气焰依然高涨。这时我自浙江归来，省委派我到建瓯工作，我寄居在中山路一位亲戚家里。他是我表弟，他家开设《雅青印刷所》（这是我和省委约定联络地点），我的住处就在印刷所对面，原春和布店内进的厢房里。当时我是以《前线日报》记者身份在建瓯活动的。

在初冬的一天傍晚，印刷所的一个小学徒匆匆地跑到我的房间来对我说："有人来店里找你。"

我忙问："谁？"

他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说："一个农民。"

我也感到突然，跟他走到印刷所，在暮色苍茫中看见一个头戴斗笠，身穿对襟单衣、短裤，手里提着一尾鱼的人，被几个店员围住在讲述着什么。

"啊、老孟、是你。"我惊喜地和他紧紧地握手，便拉着他往回走。

走进房间，我看到他那古铜色的方脸上，透露出青白色，咀唇发紫，那眼神却是安祥而有笑意。他显然是又饿又冻了。我连忙给他倒了一杯热茶，为他端来一盆热水，找出我的衣服让他换上，却显得太窄少，很不合身。

"你怎么来的？"我问。

他告诉我在建阳被特务跟上了。拐弯抹角把“尾巴”甩掉，便躲到溪边的民船上，和船工换了衣服，买了鱼，装做回家的样子，一路上步行到建瓯来。他沉着机智地摆脱了特务的盯梢，来到建瓯。《雅青印刷所》的职工们询问他时，他却巧妙地隐瞒真相，编造了在旅途中被歹抢劫的故事。店员们听了都为他庆幸。（当时国统区土匪拦路抢劫是常见的事。）他似乎忘了自己一场惊险的经历，而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天晚上，我们挤在一张小床上，谈到午夜。

第二天，我上街为他买了衣服鞋子，打扮起来象个文化人。

老孟告诉我，他和省委约定回机关的时间还没有到，必需找个临时工作。我自己是寄居在亲戚家，又经常要出门，不可能留他长期住下，但我还是劝他休息几天再说。并告诉他：“陈培光在瓯中当校长，你出门时要注意。”他听了却说：“我去找他谈谈。”我一听愣住了。找他会不会出问题呢？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他。孟说陈和他的私交还可以，估计不会出问题。过了两天，孟便到黄华山建瓯中学去找陈培光。他回来告诉我，陈培光答应聘请他为代课教员。次日，他便去学校里隐蔽下来，临行前，他叫我不要到学校里去找他，有事他会来找我。他在瓯中呆了多久我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我们又在武夷山上重逢。

以后据一位瓯中的老师告诉我，琇焘同志在学校很受欢迎。陈培光向师生们介绍说：“孟先生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很有学问”。

三、武 夷 山 上

一九四三年春天，省委在武夷山区举办“城市干部学习班”进行整风，在城市工作的同志，都集合到省委机关来。山上一下子便热闹起来了。沿着山坡，搭起一间间竹棚，学员按照来自不同的地区分散居住，每人都戴上面罩，编以代号，彼此不相认识，（秀焘同志是武干二号）

听说孟琇焘同志的新婚爱人张聪敏同志也来参加学习，我便跑到山坡下最末的一间小竹棚里去探望他们。（因为我们是熟悉的，所以允许互访。）进了竹棚，在六、七个平方大小的空间里，靠窗口下钉着一张小竹棹，桌上放着一些文件和日用物品，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竹叶，覆盖着一条灰色的棉毯，可能这个竹棚是临时为孟夫妇搭的，这便是他们的“洞房”。秀焘同志招呼我在地铺上坐下，我们便闲谈起来。

“你们结了婚，该请喜糖了！”我戏谑地向他们伸出手来。琇焘同志被逗得涨红了那张酱色的脸，眯起他那双会笑的眼睛，拍打着我的手掌，聪敏同志站在一旁笑了。我很清楚，一个革命者结婚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在当时的环境里，买喜糖是办不到的。

我问他，开学典礼你们准备了什么节目？他们笑而不答。

几天后，开晚会了。“舞台”是在山坡上掘成的一块平地，台的两旁升起两柱松柴火炬照明，舞台上没有布景，没有道具，台中央放着一张竹桌，同志们在坡下席地而坐，啦啦队此伏彼起，“赤石暴动”逃出来的丁克同志最活跃，他指挥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唱歌，又领着啦啦队呼喊。情况空前地热闹。（我这里特别提到丁克同志，是因为他在反“清剿”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了，终年仅廿二、三岁，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借此，我对他表示深切的悼念！）

晚会的节目是丰富多采的，孟琇焘同志夫妇也演出了闽剧“三司会审”。这齣戏是叙述封建社会中一对青年男女摆脱礼教束缚，经过一段悲欢离合而团园的故事，他们没有化装，服装是用绸被面缝起来的；也没有锣鼓和乐器的伴奏，他们却演得很逼真。博得同志们的喝采。琇焘同志是个腼腆的人，平时要独唱一支歌也会感到窘迫。为了同志们能轻松愉快地参加学习，他鼓起勇气“粉墨”登场表演了。

四、台　北　相　遇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定》，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

这年年初，我被迫离开厦门去台北。同年十二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候诊，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走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琇焘同志。我高兴得从长椅上跳起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眯起笑眼却不回答。我才意识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便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说：“到我家去。”我们走出了医院，他示意我在前面走，他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不一会，走到了东门仁爱路我的住所。

我住的是一幢日式平房，没有同居，谈话也很方便。我向

他汇报了我在大陆到处受特务追捕情况以及国民党接收台湾以后，承袭了日本统治台湾的衣钵，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极端不满和反抗情况。他也谈到了目前形势和任务。他告诉我，这次到台湾来的目的：一是准备在台湾开展工作；二是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为了他的安全，我介绍他到北投张士英同志处住宿。

不料此次相逢，竟成永别。解放初，当我听到琇焘同志因福州“布案”而被蒋匪帮杀害的噩耗时、不禁黯然泪下。我党失去了一个好儿子、好战士，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中国革命在千千万万象琇焘同志这样对党、对人民赤诚忠心的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下取得了胜利，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我们为祖国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不息！

琇焘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十年代上范革命的片断回忆

谢 贞 梁

（一）上范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一、地 理 形 势

上范是建瓯东游公社一个大队。上范、钱山、上洋三个自然村鼎足而立，形如“品”字，但一向交通不便，陆路只有一条西北通东游的小道，东西一条小道通溪屯、盛前而往屏南等地。水路也只有一条浅溪，仅能用竹筏代船，通东游等地。

二、政 治 面 貌

国民党的统治下，地主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苛捐杂税的负担，乱抓壮丁、乱拉民夫，贫苦无告的农民难以避免——我的外甥就是被抓去当民夫，挑担到远处，死在异乡不复返。

（二）三十年代上范革命事实。

一、革 命 起 因

三十年代上范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起因是什么？

主要是由于有知识分子带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来宣传教育起作用。

我不讳言，我是上范第一个在外读书的人，寒暑假回到家乡时，曾办短期义务农民识字班，贫苦农民对我是有好感的。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诬陷我，多次到过上范调查我。乡民们为我仗义直言，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我在上范是有群众基础的，因此，张剑平、黄可英同志到上范住我家从事革命活动，较长期地安全无事，不受危险：一、由于群众掩护；二、也由于叶秉燮同志（解放后病故）是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关系人，他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东游区长，那时他对我们是有掩护作用的。

二、革命经过

第一阶段：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张剑平同志，中共地下党建瓯县委领导人，久住在张伯坚（即张祯）家。那时张伯坚是梨山小学校长，我是梨山小学教员。我住在校内，张剑平同志时常到我宿舍来玩，谈话中我很佩服他的革命理论。我学过世界语，他也学过世界语，更加深了我们志同道合，感情融洽。一九三一年我被反动派逮捕保释后不久，正值方志敏率领红军入闽，攻下邵武的时候，震惊了建瓯反动派，他们争先恐后地逃跑出城到农村去，城里各校也无形中停课。张剑平同志来邀我趁此机会到乡下去活动，宣传土地革命。于是我就同他一道到我的家乡上范村住在我家里，他在上范主要是宣传红军已打到邵武，革命节节胜利，这给宣传土地革命带来极有利的条件。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是在晚上秘密进行的，宣传的对象贫苦农民。反对地主的地租剥削，苛捐杂税的加重贫苦农民负担。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宣传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反动封建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等。对贫苦农民进行政治宣传。

张剑平同志是闽南人，不会讲本地话，对贫苦农民宣传，都是由我作翻译。

第二阶段：一九三二年九月黄可英烈士来到上范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斗争是很激烈的：

①斗土豪：一九三二年上范土豪谢发婢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人是“土匪”，是“共产共妻”，乱搞男女关系，要杀共产党员。黄可英烈士发动贫农团，把他抓到张源岬斗争致死。

②抓联保主任：国民党联保主任李金标算是钱山村人，一向反共反人民，专打红军游击队。他为了防卫红军游击队的袭击，在自己住宅大门边，利用职权役使民工、为他义务出工，建了一座碉堡。他勾结地霸叶凤尧，另一地主武装一心会头头李子茂，为虎作伥，，鱼肉乡民。叶凤尧是党城的地主恶霸，与钱山李子茂是乳兄弟关系，他解放前几年为了便于量田收租曾一度住在李子茂家。他在城勾结官府，有权有势，他带丈量员量地，他钱粮加给别人完，自己收租不完粮。旱年或其他灾年，歉收或绝收，他的佃户要求他减租，却颗粒不准减，有反抗的，他就带兵去催租。黄可英烈士发动贫农团，打开地主仓库，把谷子搬出，救济贫苦农民，就是他带领地主武装一心会到上范抄农民的家，强迫他们超额退赔，为首被抓去城里坐

叶凤尧

牢，所以李金标俨然是乡里的土皇帝，故叶文煜、陈希先两同志先后打入该联保办事处当文书，探听内情、徐幼华同志打入伪东游区公所当区员伺机对付他。有一次伪公所有某任务，该联保不能完成，徐借机打了李金标几个耳光，以扫除其威风，为群众出了气。

③劫地主谷庄：东游地主王豹文（解放后被镇压）有谷庄在上范大队的上洋村。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这个谷庄的仓库，存谷几万斤，当年因旱灾歉收，青黄不接，农民除还地主租谷以外，无米为炊，特别是贫苦农民更无门路买谷或借谷度日，于是黄可英烈士发动贫农团，联合游击队打开王豹文的谷庄仓库，一夜之间，把几万斤存谷，搬出分发给贫苦农民吃。后来，叶凤尧带领地主武装到上范抄农民的家，要他们超额退赔，并把几个为首的挑谷农民抓去城里坐牢，把谢贞椿（贞梁胞兄）带到东游审问，把一裁缝抓去枪毙（在他身上搜出一块红布条，硬说他是红军）。

④夺伪区公所的枪：东游是国民党的区公所所在地，有少量的枪支。一九三二年黄可英烈士为了扩充革命武装力量，发动贫农团、联合游击队、前去东游，劫伪区公所的枪。事前已与东游方面同志约定时间，准备船只，渡上范的同志过河。不料东游方面有个内奸名叫“秋子”的告了密，到时栅门紧闭，开枪射击，上范同志只好回去。好在当时东游区公所力量薄弱也不敢追赶。

我的父亲陈希先

陈 述 仁

我的父亲陈希先，名迅，又名邦俊，号绍霸，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城关小梨山。祖父陈超宇是中学教员，早年逝世，留下父亲弟妹五人。我父自幼好学，爱国心切。在梨山小学读书时，祖母讲的岳飞抗金卫国、林则徐禁烟抵寇的故事，牵动了他幼小的心灵。每年五月九日纪念国耻，他总是积极参加游行，坚信国耻终须雪，并加歌词："立定志向，卧薪尝胆，誓报国耻，请看我铁血。为报国仇，振兴中华"。他学习努力，从小临摹碑帖，笔法刚劲有力。他看了不少古今名著，特别爱看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爱读杜甫、王维的诗文。他读书专心致志，见得亲切，用得透脱。听长辈说，有一次，他在家中谈王维的"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的诗句时，祖父问他："你长大后如何报国？"他想了一下就回答："苦攻书争做国家栋梁，勤锻炼誓为国献身"。他十四岁高小毕业。高小毕业考试系当时知事周诗主考，命题作古文，父亲因文理通畅，书写平整，知事看了称赞不已，当场将手中的纸扇赠给我父。小学生临考得知事如此爱重，一时传为佳话。

一九二五年秋，父亲在省立第五中学（即建瓯第一中学）读书，跟杨又仕等志同道合，经常一起阅读共产党员杨峻德从北京寄来的《觉悟》、《响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马列主义的道理。

一九二六年冬，党代表肖劲光、师长戴岳、付师长朱耀华率领的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驻在建瓯，出示安民，宣布废除军阀统治的一切苛捐杂税，群众欢声雷动。父亲在建瓯革命运动创始人杨峻德烈士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庆祝北伐胜利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群众大会及其他群众活动。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建瓯支部成立。父亲跟杨又仕和其他进步同学，参加了抓军阀县长谈国政，打贿赂公行的法院，反对宗教迷信，毁庙祠神象，宣传革命道理的运动。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内、国民革命军入闽后的第一个劳动节，也是建瓯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建瓯人民满怀热情，参加了盛大的庆祝会。这一天，父亲欣喜若狂，天一亮，他就跑到学校跟杨又仕等“十兄弟”忙着准备参加庆祝大会的工作。这一年，父亲和叔叔陈希昭由杨又仕介绍参加了CY组织（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们坚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斗争，中华民族才能崛起，神州大地才能换新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处于低潮，转入地下活动。父亲就时常以耍傀儡戏为名，掩护革命同志在家中开会，叫姑姑陈希瑶在大厅放哨，继续革命工作。

一九二八年初，我父亲由杨又仕、翁树年介绍，光荣地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即C、P）组织。同年夏天，省教育厅派张琴来瓯接翁树年任校长。张一到校，就施展独裁手段，以整顿学风为名，开始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共产党人。张琴借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学风，开除了杨又仕、詹楚材、陈希昭和我父亲等四十余人，几乎占当时全校学生１６０多人的四分之一。被开除的叔叔希昭到了福州，我父仍在瓯坚持斗争。他和留瓯几个党员，配合在校的大部份同学，掀起了倒张的怒潮。他们写了控诉书向省里控告，散发了大量传单，向各界呼吁声援……。父亲的聪明才智和爱国行为，受到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党人朱剑鸣的称赞和支持。

一九二九年春，父亲由朱剑鸣介绍，认识了出身贫寒，同情革命的母亲许宝玉，并订下婚事。不久，和在福州乌石山师范读书又因在校闹学潮被开除的叔叔陈希昭一起考进省立建瓯乡村师范。进校不久，祖父病逝，因家无长辈，小梨山祖屋被国民党党干谢伯抡无理霸占、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在家破人亡，生活无靠的困境下，三个姑姑在亲戚朱剑鸣的关照下，送进福州乌石山孤儿所、双亲均亡、兄妹分离、泣不成声。在分离之夜，父亲告诉妹妹："我们不是命运注定穷，革命就不穷"。饱尝困苦的父亲和叔叔此后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省委为了加强党的工作，特派黄可英同志利用校长谢东山在福州的师生关系转来乡村师范，以读书为名，实则是担任恢复组织，重建党团的工作。沙县人黄可英是个会说能道，善于联系群众的青年。来校不久，就跟沉默寡言，遇事沉着的父亲和富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叔叔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父亲和黄可

英介绍了刘题园、杨霖章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CY）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发展党团，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革命的行动，触动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又大肆逮杀共产党人。在那阴霾笼罩大地，魑魅横行四野的日子里，父亲由于革命的需要，男扮女装乘坐小轿，出了城外，又冒着风雨，顶着恶浪，沿着建溪，乘舟抵榕。临走前，父亲写了一张留言条给黄可英、张沭以及他的战友，要他们“象上学期一样工作和努力”。这留言条，他们夹在暑假民众夜校教书的一本记事本上。九月，乡村师范发生了一起逮捕共产党分子的案件，黄可英、张沭、叶世、徐幼华、杨霖章、占楚材等九人被捕。反动派搜查出他们的记事本，发现父亲给他们的留言条竟作为他们是异党分子证据之一，把九个志士手铐脚镣，押送福州。黄可英被判有期徒刑。建瓯地下党遭到了破坏。

在福州，父亲与福州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曾写信给我叔叔（希昭），信中云：“吾今于汝写家信，挥笔千语说不尽，肩负重担为祖国，望弟为党多贡献。”没料到，此时叔叔正病伤寒，怕泄露目标，不敢请医治疗，病死在家。以后，他的丧事还是靠地下工作者和亲戚料理。父亲在福州工作一段，由组织决定又转赴建瓯。

一九三〇年初，他奉福州市委指示回瓯后，不因县委机关的破坏，负责人的被捕或转移而气馁，他跟杨又仕、张伯坚、黄希益等继续在建瓯、政和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三一年，福州市委指示，“建瓯、建阳要将旧的基础整理起来，发展新的组织，举行严格的重新登记，将一切阶级

异己分子、腐化不工作的肃清出去”。二月，市委派张剑平到建瓯，并进行整顿和重新登记。经过整顿后重新登记的党员有：杨又仕、张伯坚、张沭、詹何、徐幼华和我父亲等人。后由于革命的需要，组织决定让我父亲赴上海工作。

他在上海明锠机器厂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继续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八十万工人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父亲参加了联合会，还在厂内参加抗日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爆发了。十九路军抱着尺土寸地也不能放弃的决心，奋起抵抗。此时，党发动上海工人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父亲带领厂内工人跟上海九十万工人一起，举行了反日总同盟罢工。

一九三五年，日本调集大批军队入关，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父亲又跟上海工人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振臂高呼：“打倒汗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这五年中，父亲只写两封信给我母亲。其中一封，仅告诉我母亲他在上海某厂做工，望她勿念。另一封，只谈将要从简婚事，并寄上他的相片。在相片背面，他题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诗。

一九三六年春，父亲回瓯结婚。他的婚事全靠朱剑鸣的夫人和其他亲戚的支持。不久，他又赴沪。在家半月中，他把在沪的活动情况略告我母，激发她爱国忧民之感情，教育她“坚守机密之重要。离瓯前夕，建瓯地下党同志徐幼华等曾到家看望他。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了。父亲腿部负伤，沿途讨乞，备尝艰苦，返瓯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父亲伤愈通过徐幼华和陈希珍的介绍，与建瓯地下党联系上，并参加活动。以方文治、张沐、徐幼华组成建瓯县委。已于三七年成立，县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吉阳、党城支部和小梨山小组，小梨山小组先设在梨山小学，后因引起敌人的注意与破坏，改设在我家中（现小梨山12号）。这年春天，谢××和杨××（现浙江宁波一中教师）由陈希珍介绍入党、团组织就在我家中。

清明节那天，我父打扮成砍柴的和我母到朝天门外“孩儿坐轿山”扫祖墓。当他第一次看到叔叔希昭的墓碑时，不禁叹道：“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一边叹息着，一边环视着松柏挺立的坟山，对我母说：“一个革命者随时都有为革命牺牲的可能。你叔仔葬身之地选得好。”他停了一下，指着前方继续说：“你看，他面向建溪，能望日出；他背靠群山，可稳如泰山。

这一年春夏之间，我家曾有特区交通联络人员来往，并保存着不少革命书籍。这些革命书籍大部分是组织上千方百计输送到瓯的。父亲为了宣传革命道理，传送党的文件，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挑担补鞋的，到上级指定的地点，取书传文。一次，他冒着风雨，戴着斗笠，穿着粗布的兰色民衣，挑着担子，跋山涉水地带来了二十余册的革命书籍和党内重要文件，到了家，已是次日夜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